

钟楼街史话之

## 唐宋古刹遗竹帛

## 1 宋建寿宁寺来龙去脉 (上)

王继祖 王琛

太原钟楼街之街史，溯其源头在盛唐之唐明镇，讲其发韧或滥觞，却是宋初所建的太原城。再具体些，便是太原宋城中的官街“东门正街”，东门正街上的寿宁坊。寿宁坊，作为东门正街最西端北起第一坊，除了留下坊名和坊址外，最能作为标识的地标志性建筑，就是寿宁寺了。

太原府载：“寿宁广化院，在府东门正街北第一寿宁坊，宋端拱二年额，有宋真宗所撰《太宗御书碑》，碑阴列其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尝以书赐，今已不存。”

为证明其载真实无误，大典还引《元一统志》所载为旁证：“《元一统志》‘寿宁院，在府寿宁坊街东，金会间重建。宋大中祥符四年，太宗御制御书。’”

上述两则史料均出自《永乐大典》，但都不是大典所撰，而是其录。前条录自《太原志》，此书早佚，应是宋金时代之著；后条录自《元一统志》，此书尚存。这是关于寿宁寺现存最早的史载，弥足珍贵，其他误传、误载、讹说、讹记，到此都应该打住，再不应该随意地、不负责任地、不严肃地以讹传讹了。

需要强调的是，过往关于寿宁寺“创建于宋朝大中祥符八年（1410）”“宋大中祥符四年”“宋大中祥符年间”“宋时建”等多种说法，都属错误的、不准确的，是以讹传讹的，或失之笼统的。首先，关于寿宁寺“创建于宋朝大中祥符八年”之说，在太原影响最大、引用最多，但是，此说既不见之史载，又不见之志乘，现存四部《太原府志》（永乐、万历、顺治、乾隆）、两部《阳曲县志》（康熙、道光），均无此说此载。确属个人一家之言，所谓“创建于宋朝大中祥符八年”之说，无载无记，无本无源，是出自误记误录？还是主观臆测，实是不得而知。应属失误，应该得到纠正，不应谬说再传。

其次，寿宁寺建于“宋大中祥符四年”之说，可能是来自于《元一统志》。此说，似乎是清朱彝尊最先引用，因为，朱在其《宋太宗寿宁寺书碑跋》中说：“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书勒石在太原府寿宁寺”。但是，朱彝尊碑文中用此说，并无错误，因为，朱是说宋真宗御书勒石于寿宁寺之时间，并非寿宁寺建寺时间。后来引用此说者，没有弄清这点，便误打误说，寿宁寺创建于大中祥符四年，错在失之于浮躁，误将真宗勒石之时间，当成寿宁寺创建时间。此误，一纠便可更正，指出即可。

第三，关于寿宁寺创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的说法，严格讲完全是谬说。这个错误，非出自今人之手，首错在万历《太原府志》，是它最先在其“古迹”中说：“寿宁寺，宋大中祥符年建。”康熙《阳曲县志》不认其说，以为谬误，但又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遂以简而概之的手法纠错，在其“庙宇”中笼而统之：“寿宁寺，宋时建”。虽失之于笼统，却没有失误，还修正了万历《太原府志·古迹》所载之误。

但是，号称严谨、长于纠正过往志书之失的乾隆《太原府志》，在校核寿宁寺创建时间时，却取万历府志之载，去康熙县志之述，以讹为正，将万历志误文“宋大中祥符年建”，照搬录用，讹传后世。追思乾隆府志之误，似应误在“记明代之事，则重明代之书”的常规性认识失误。可能是乾隆府志的编纂者以为，康熙县志，记寿宁寺之创建时间太简、太笼统，不足以取之的原因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管之见。

于是，万历《太原府志》错了，乾隆《太原府志》照搬照抄，错了；道光《阳曲县志》以讹传讹，也错了。总之一句话，关于寿宁寺的创建年代，太原现存的府志、县志，除康熙《阳曲县志》之外，其他各种版本的志书所载全都是错误的、失实的、以讹传讹的，无正确可言。其谬误之源，正是方志之乘久有之痼疾，“因因相袭”。

第四，康熙《阳曲县志》在其卷五“庙宇”中，对寿宁寺创建年代“宋时建”之载，虽然没有失误，但是，却不能算作准确。为什么呢？北宋王朝从公元960年立国开朝，年号建隆，迄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亡于金，上下166年，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还多，你说“寿宁寺，宋时建”，实际上等于说：寿宁寺创建于公元960年至1126年间。这样笼统，笼统到匪夷所思，能叫准确吗？正确无误的不准确，在此，在这个意义上，比上述各种错讹、失误，都更显得有些滑稽。康熙县志的编纂者们，为什么要如此“述而不作”呢？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万历府志所述可能有失误，颇需斟核。但是，时间或条件，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使他们一时无法弄清或质疑，于是以“宋时建”概略纠误。手段确实高明，方法是用“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问题，瞅准大年代，一以概之”。谁承想到我们的古贤在处理史事时，竟有如此看似高妙、却有失愚痴之陋。

寿宁寺是寿宁坊存于史册的唯一，所以，颇受宋之后历代史册、志乘之青睐，总有一些记载，虽然大多数是支离的、破碎的、简略的、模糊的，有些甚至是失误的、讹传的。当然，也有一些正确的、准确的信息，没有明写，而是深藏在史载的字里行间，需字斟句酌，加以分析甄别，才能发现其所揭示的基本内容。仿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永乐大典·

太原府载：“寿宁广化院，在府东门正街北第一寿宁坊，宋端拱二年额，有宋真宗所撰《太宗御书碑》，碑阴列其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尝以书赐，今已不存。”

## 寿宁寺创建年代的几种误载

寿宁寺  
创建于  
端拱二年

那么，寿宁寺究竟建于哪一年，能有个准确的答案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答案就在太原的地方志乘中，就在《永乐大典》全书收录的《太原府》中，只不过《太原府》没有明确写出来，而是收录在有关寿宁寺的一些篇章中，就如同我们平常说的一句话：答案就在窗户那一边，一捅破窗户纸，答案便会脱颖而出。

太原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乘，名《太原府》，全书见载于《永乐大典》“五一九九卷”至“五二〇五卷”。是书成竣于晋王府已经建成、太原城尚未扩建的明初洪武八年前后。

永乐年间编纂《永乐大典》时，《太原府》以“原”韵载入，在其“卷五二〇三”的“寺观”中，有不长的一段关于寿宁寺的记载，本系列文章一开始就已经录用，为加深记忆和理解，更为了纠正数百年来讹传寿宁寺创建年代的失误以及讹传带来的误导，我们再次以突出的方法，把这段史料的原文摘出，呈之于此，并逐句析释，校雠失误，还寿宁寺创建年代之本原：

院本府《太原志》：

寿宁广化院，在府东门正街北第一寿宁坊。宋端拱二年额。有宋真宗所撰《太宗御书碑》，碑阴列其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尝以书赐，今已不存。

第一句告诉我们，寿宁广化院在东门正街最西端，街北第一寿宁坊，寿宁寺名因坊名而得。第二句告诉我们，寿宁广化院山门上的匾额，是端拱二年题写的。第三句告诉我们，寿宁广化院中，有宋真宗为其父皇太宗皇帝撰写并镌刻的《太宗御书碑》，还在碑阴面将太宗赐予寿宁广化院书籍的书名，一一镌刻于石。第四句告诉我们，寿宁广化院中，还有寿宁广化院建于端拱年间的碑记。第五句则说，宋代太宗曾经以皇家藏书赐予寿宁寺，如今已散失无存了。

仅第二句，寿宁广化院院额（寺名匾额），是端拱二年所题，就明确地告诉世人，寿宁广化院，在宋太宗赵光义为帝时的第十四个年头，第三个纪年“端拱”二年已经建成，并且在寺院山门悬挂了寺额。端拱二年是公元989年。试问寺庙不建竣，何以悬挂寺额？第四句，则进一步告诉世人，寿宁广化院建成后，即于端拱中勒石树碑，以资纪念，碑刻所勒之年代为“端拱中”。查历史纪年，太宗“端拱”共两年（988~989），由此便可断定，寿宁广化院，创建于公元988年或989年。而且，初建后的寺院规模并不很大，何以见得？宋人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卷六》云：“（寺院）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则曰大寺，次曰院。”据此，则可知初创时的寺名之所以为“寿宁广化院”，就是因为规模还不很大，只能按“次曰院”的规矩而名之。

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因为北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赵光义，青睐于新建并州太原城中规模并不算大的寿宁广化院，遂赐予寺院皇家御览之图书。由是，这座寿宁广化院声名鹊起，已非当日。未几，北宋的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又亲撰御文，为父皇赐书寿宁广化院之功德碑立传。一时间，太原城中对先皇赐书、后皇树碑的炒作，把一座不大的寿宁广化院抬举得如日中天。于是，小小的寺院，身价陡增，名声大振，香火日盛一日，寺院因势而扩，终于演绎成一座大丛林，寺院之名也由寿宁广化院，晋升为寿宁寺。

述及寿宁寺之名，何止于此。“寿宁广化院”是最初之全称。在使用方便中，时人简称其“寿宁院”，也有些史料亦简记为“寿宁院”。溯其名之所得，先有寿宁坊，寿宁坊与宋并州太原城，同时建竣于北宋初太平兴国七年（982）。寿宁寺于7年后的宋端拱二年（989）年建竣于寿宁坊中，遂以坊名为寺名，“寿宁广化院”中“寿宁”两字正得之于寿宁坊。而“广化”两字，则泛指佛法广化众生之意。寿宁广化院，简称为“寿宁院”，这一点在《元一统志》和《永乐大典·太原府》中已有确载：“寿宁院，在府寿宁坊街东。”可见，“寿宁院”是寿宁寺的第二个名称。

寿宁院后来以“寿宁寺”为名，虽可能得之于北宋中叶，但出现于史志，则在明万历《太原府志》之“古迹·寺观”中。原文是“寿宁寺，察院西”。依秩而论“寿宁寺”是其寺的第三个名称，自此之后，各种版本的志乘中，再不见“寿宁广化院”“寿宁院”之称，都以“寿宁寺”名之。直到清乾隆《太原府志》、道光《阳曲县志》，寿宁寺又出现了“寿宁教寺”之名。道光县志在其《舆地图上》的“城内寺庙”中说：“寿宁教寺，在臬署（按察司）西。”于是，寿宁寺又有了“寿宁教寺”这个名称，它便是寿宁寺的第四个名字。此外，寿宁寺还有一个别称叫“打钟寺”，见载于明万历《太原府志·古迹·寺观》，原载是“寿宁寺……俗呼打钟寺”。

毋庸置疑，无论是寿宁广化院、寿宁院，还是寿宁寺、寿宁教寺，甚至打钟寺，它们都是寿宁寺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过的寺名，属于一寺多名的历史存在，个中反映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